

Globethics Repository



《談道百篇》與聖經：影響與張力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Chen, Yuhao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9-23 06:55:58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22

《谈道百篇》与圣经:影响与张力*

陈 昱 昊

内容提要:晚清中国基督徒杨用之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一组以圣经为题材的教义诗《谈道百篇》。这组诗歌以中国传统诗歌形式宣扬基督教教义,一方面,诗歌的结构、形式和语言深受圣经影响;另一方面,诗歌的主要内容在较好地传达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同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形成了张力。通过解析这一文本,既可了解《万国公报》宗教类文学作品的某些特点,也能对近代中国基督徒文学书写的特征有所把握。

关键词:《谈道百篇》;圣经;《万国公报》;基督教文学;影响与张力

Poems *Tan Dao Bai Pian* & the Bible: Influence & Tension

CHEN Yuhao

Abstract: Written by the Chinese Christian YANG

* 本论文选题来自笔者的导师李跃红教授,写作过程中亦蒙其指导;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郝超慧、李萍等协助搜集、整理相关资料,谨致谢忱。

Yongzhi, a sequence of poems taking Christian doctrine as the subject matter named *Tan Dao Bai Pian* was published by *The Review of Tim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poems convey Christianity with the form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On the one hand, the structure, form and wording of the poem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Bible deep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poetry expressed the Christian doctrine accurately and formed a tension on the text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analysing the text, we can understand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religious literature works as published by *The Review of Times* and catch the main features of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Key words: *Tan Dao Bai Pian*; the Bible; *The Review of Times*; Christian literature; influence and tension

一、《谈道百篇》的写作背景与研究价值

鸦片战争以来,传教士们为使中国成为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纷纷来华并创办中文报刊,以此传播基督教思想,但在具体内容上则兼有时事和西学。据统计,“在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①其中以美国监理会在华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最为知名。《万国公报》的前身是1868年创刊的《教会新报》,1874年该报因销路问题改版为《万国公报》。《万国公报》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从1874年改版至1883年停刊,后期从1889年复刊至1907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万国公报》介绍与推举西学力度之大、介入之深为其他报刊所少见,报道时事之准确与广泛也为其

① 王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1页。

他报刊所难企及,如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其提供的报道被认为是“关于中日战争的唯一真实的报道”^①。因这些特质,《万国公报》为时人所重。然而《万国公报》登载西学与时事毕竟是其传教的手段,涉及中国国事时又往往站在英美国家的立场上,所以到了20世纪初,《万国公报》随着中国人自办报刊的崛起而衰落,终在1907年停刊。

《万国公报》所载西学方面的内容很受重视,其他方面的内容却罕有人注意,其中就包括文学作品。《万国公报》先后刊登了将近1000篇文学作品,包括诗歌、辞赋、寓言、译介文学等,^②其中,中国基督徒所写的诗词曲赋占了很大比重。本文所要分析的《谈道百篇》就是武汉伦敦会的中国基督徒杨用之^③以中国古典诗歌的文体形式评述圣经经文的一组作品,连载在前期《万国公报》的第507卷、514卷、523卷、524卷、525卷、526卷、531和532卷上,共100首。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对杨用之其人不能有充分了解,只能从《万国公报》中找到一些线索。这个名字始见于1871年第137期的《教会新报》,他曾于1871年、1873年、1874年在该报发表诗歌作品。《万国公报》出版后,杨用之在1875年到1881年七年间发表了225首诗歌和辞赋,数量相当可观。他不仅是《万国公报》文学作品创作队伍中的一员,也是被描写的对象之一,1880年的第612和614卷就刊登过以送别他为主要内容的诗歌。这种类型的

① 王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第240页。

② 在相关研究中被提及的只有两部小说,分别是中国基督徒所写的《引家当道》和传教士改译的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的小说《回顾》,后者登载时改名为《回头看纪略》。见黎子鹏:《晚清基督教小说〈引家当道〉的圣经底蕴与中国处境意义》,《圣经文学研究》第5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79—95页。袁进:《论西方传教士对中文小说发展所作的贡献》,《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75—179页。

③ 杨代春:《〈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诗歌有一定数量,但描写的对象只有14人,其中11人为传教士,3人为中国人,杨用之就在其中。可见杨用之在刊物中的地位不同寻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诗歌的重要性及代表性。而这组作品以中国古典诗歌形式承载基督教思想的特征,也使之有可能在宗教与文学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论题上给我们以启迪。笔者期待透过对这组诗的分析,来了解圣经对中国基督徒创作的影响,以及晚清基督徒所面对的圣经教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张力。

二、《谈道百篇》所受圣经的影响

在《谈道百篇》的100首诗歌中,94首以评述圣经经文为主要内容,其余6首总结升华组诗的思想。其中,前40首评述《旧约》经文,登载于前期《万国公报》的507卷和514卷。这40首诗歌的内容涵盖39部《旧约》卷籍,除《耶利米哀歌》有2节经文被评述外,其他38卷书各有一节经文被评述。后54首诗歌评述的对象是《新约》经文,分别刊登于前期《万国公报》的523—526卷、531—532卷。在27部《新约》卷籍中,每卷书有两节经文入选。组诗的排序与圣经卷籍的顺序也一致,以《创世记》起始,以《启示录》终结。总结升华组诗内容的6首诗歌登载于532卷。《万国公报》上的教义诗为数并不少,但直接取材于圣经的只有《谈道百篇》,它们在不同方面受到圣经影响,这里主要考察两个方面:

1. 诗歌结构所受圣经的影响

加拿大文艺理论家弗莱曾指出,圣经叙事中存在着U型结构模式,其故事的开头和结尾是顺境,中间部分则充斥着不幸与痛苦,如同一个英文字母U。《谈道百篇》也有与之相类的结构。《谈道百篇》虽然是诗歌,但却是大规模组诗。在中国诗歌中组诗的最早形式见于《诗经》的连章诗,具有复叠章法。如《诗经·秦风·无

衣》一诗共三节，每节的结构相同，为“岂曰无衣，与子××，王于兴师，修我××，与子××”^①。后来组诗的形式发展为同一主题下的多首诗歌，如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和《后出塞五首》。这两组诗歌完整展示了百姓从军十余年的生活，“叙事线索明晰，形成一个整体”。^②在基督教文学传统中，组诗也不少见。特别是各类赞美诗，都给人以回环往复、一咏三叹的美感，如意大利人法兰西斯写于1225年左右的《太阳颂》，全诗除第一节外，诗歌每节的第一句都是“赞美我主”^③，赞美与感激之意跃然纸上。相比于一般诗歌，组诗可以融会多种文体的特征，其中就包括叙述性文体。因而，用叙事的U型结构来分析组诗是可行的。

弗莱分析U型结构时说：“在喜剧中，一系列的误解与不幸使剧情跌到令人惊吓的最低点，然后来了某个幸运的转折，把全剧的结尾推向快乐的结局。我们可以把整个圣经看成是一部‘神圣喜剧’，它被包含在一个这样的U型故事结构之中。”^④在他看来，圣经的叙事由大大小小不同的U型叙事单元构成，每个单元都有一个从高到低再回复高处的轮回，这些单元的共同作用使得整部圣经成为一个宏大的U型。《谈道百篇》也表现出这一特征。在全部100首组诗中，每两首诗歌便构成一个单元，共计50个单元，每单元中的两首诗歌都呈现出对立关系：前一首的主题是人因悖逆上帝而沉沦受苦，后一首为上帝不计前嫌施以拯救。

譬如在第一个单元的两首诗中，第一首“行为邪僻”描述的是

-
- ①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卷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20页。
 - ② 李正春：《论唐代组诗的结构艺术》，《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第93页。
 - ③ 麦格拉斯：《基督教概论》，马树林、孙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2—213页。
 - ④ 诺思罗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0页。

世人因背离上帝而被上帝灭绝,第二首“生育繁多”则描述了上帝的恩典使以色列繁荣昌盛。在6首总题诗歌中,沉沦与拯救的主题体现得更为直接,诗歌的三个单元对拯救主题的揭示与升华逐层递进,并在最后一句诗中得到最凝练的总结:“好听福音,从此不陷罗网。大哉天恩浩荡,佑启我后克昌。咸播福音。”^①也就是说,福音是脱离人世苦海的唯一良方,除此别无他法。而每诗的首句对主题也有鲜明体现,如在诗歌表现《旧约》的部分,单元前一首开头四个字是“苦海无边”或“无边苦海”,后一首开头四字是“天恩浩荡”或“浩荡天恩”;在表现《新约》的部分,单元前一首第一句是“苦海无边难自救”,后一首则以“天恩浩荡拯万民”为首句。因此,组诗的模式就是“沉沦——拯救”循环,最终落实于福音拯救世人,与U型结构所依循的“乐园——受难——得救”模式极为相似,两者都是从消极和不幸的状态提升至相对完善和幸福的状态。

当然,组诗亦有自己的特色。第一,因为体裁原因,圣经文本的U型结构有一个完整的叙述过程,组诗的U型结构则是分别描述两种相互对立的状态,前后并无严格的因果逻辑,其联系在于圣经书卷的顺序。第二,相比于圣经的U型结构,组诗未涉及乐园这一环。这与作者的宣道目的相关,因为向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宣讲与乐园相关的罪的观念难以吸引人。中国人的观念中没有基督教式的“罪”感,如刘小枫所说,能“引起人精神上向上无力自助的心向,生命自感卑鄙、渺小、可悲,同时也是一种祈求的意念,冀求生命的重生,渴慕恢复与上帝的原初关系”^②。因此,诗歌代之以因果报应观念,不过将善恶有报换成违背上帝必有恶报,遵循上帝必有福报,进而宣扬对基督的信与爱是脱离恶的必要手

① 林乐知:《万国公报》,1879年,532期。

②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

段，达成宣教目的。这是中国基督徒为适应中国语境而做出的变更。

2. 诗歌形式和语言所受圣经的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可以说是情感和语言的结合体。文学是表现情感的，它表现情感的方式又是运用语言”^①。《谈道百篇》在内容上选择评述圣经经文，是因为圣经承载着基督教的情感与知识。而要想有效地传达这种情感，则要选择最为合适的形式和语言。《谈道百篇》选择了中国古典诗歌作为载体，但却因要传达圣经的情感与内容而染上了一层近代色彩。表现有二：其一，对浅近文言的采用；其二，对圣经词汇的吸纳。

所谓浅近文言，是文言文的一种，但这种文言“用典用得少，很少用古字难字，不讲究音调对仗，语法也比较随便，接近于白话，比较容易理解”^②。纵观《谈道百篇》的100首诗歌，有86首诗歌借用了七言律诗形式，但并未使用任何格律。用韵的诗歌所占比例很小，只有14首，包括4首五古，3首七古，1首押尾韵的七言诗，1首浪淘沙调的词，2首葩经体，3首离骚体。所有诗歌中未见一则中国典故，文通字顺，很是直白，甚至还有“无论天子与庶民，凡敌主辈须知悔”这种白话。在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中国文坛，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也许对于作者而言，《谈道百篇》并非文学作品，其诗歌形式不过是方便宣扬教义的手段。鉴于当时社会还未确立现代的文学观念，这种想法并不奇怪。这也显示出内容重于形式的倾向：格律和修辞因被认为无助于教义和宗教情感的传播而遭摒弃，近白话的浅近文言因能使所传达的内容易于理解而被采纳。另一方面，圣经也为诗歌带来了“上帝”、“耶稣”、“天国”、

① 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② 同上，第65页。

“圣灵”、“主”等大量传统诗歌所没有的基督教语汇。而循环往复的基督教观念和情感的表达也为诗歌带来了传统诗歌所没有的意境,譬如组诗每一单元前一首为“苦海无边”,后一首为“天恩浩荡”;取材《旧约》的部分每首诗歌第一联和第三联分别是“苦海无边”和“无边苦海”,或者是“天恩浩荡”和“浩荡天恩”;取材《新约》的部分每单元前诗以“苦海无边难自救”起,后诗以“天恩浩荡拯万民”和。梁启超在1899年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认为“诗的发展机遇在吸收西方的精神思想,产生新的意境和语句,融入旧诗的风格”。^①不知他是否知晓,二十年前,已有人在进行类似的实践。《谈道百篇》以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承载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与教义,呈现出基督教的意境及独有的话语方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教士报刊文学对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影响。

三、诗歌呈现与圣经经文之间的张力

一方面,圣经作为原材料,对组诗的结构、形式和语言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组诗在中国语境下对圣经经文的呈现与原文之间也形成了一定的张力。对此,可从梳理诗歌所评述的圣经经文入手加以考察。

组诗所选《旧约》经文可依据行为主体的不同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上帝的行动;第二类是人类对上帝的态度,包括对于上帝本身、上帝救恩、上帝诫律的态度;第三类是先知的行动和作为。第一类经文有23节:6节表现上帝的恩典,4节表现上帝的惩罚,6节表现上帝谴责悖逆,7节表现上帝向人宣布旨意。第二类经文有8节,以谦卑顺服上帝为内容的有6节,以藐视悖逆上帝和赞美上帝为内容的各1节。第三类经文有9节,表明上帝对先知倚重和信

^① 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第108页。

赖的有3节,先知预言2节,要求人们顺服上帝的2节,警告悖逆上帝行为的2节。

组诗所选《新约》经文可据具体内容分为三类:第一类来自福音书,以耶稣的事迹与话语为主要内容;第二、第三类来自其他书卷,其中第二类以使徒对教义的讨论为主要内容,第三类也是使徒言论,但不能概括出清晰的教义。第一类经文有10节,强调作为耶稣的门徒,首要的便是信仰与敬拜主耶稣,相信独一真神及三位一体;其次是要坚定信心,相信上帝的荣耀会与己分享,把所有艰难困苦都当作试炼,绝不背弃信仰;其三是要谦卑恭敬,全心全意依靠主的恩典,相信上帝与自己同在;做到这些之后,再向世人传播福音,令全人类归顺基督。第二类经文有16节,列举了基督之门徒所不当为之事,包括人不应重视自己而应虔敬上帝,不应放纵私欲任意胡为,不应恨恶教会的弟兄而向教会的仇人问安,不应放弃神的大道去学习其他与上帝无关的学问,不应为外人的言语和利益所动而改变信仰。第三类经文有11节,提到得享天国荣耀者必须为上帝所喜爱,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会令人对上帝无比虔敬等。

在基督徒看来,《旧约》是“上帝在世界上的作为的历史记录”^①,《新约》则以耶稣的身份与意义作为中心。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组诗所选《旧约》经文强调了上帝的存在,《新约》经文强调的是对耶稣身份与意义的认同和敬虔。但组诗是在评述而非诠释经文,因而只需要围绕着经文发表观点,而无须结合相关背景知识尽可能“正确”地解释经文,前者能够自由发挥的地方显然多于后者。在《谈道百篇》的经文评述中,作者的主观性相当突出,经文的内容是什么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将其引至沉沦或拯救的主题上,使组诗可以有规律地循环往复。在对诗歌的处理

① 麦格拉斯:《基督教概论》,第13页。

中,若“无边苦海”或者“天恩浩荡”的主题与经文内容之间具有一致性,倒也不会显得特别突兀,如《为不当为》一诗。该诗所评述的经文为:“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華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一件’”(出1:7)。从圣经上下文可知,这是耶和華向摩西下达的指令,不过话还没说完,就被断作一节。仅就这节经文而言,可以理解为若有人违反耶和華就会受到某种惩罚。诗歌是这样表述的:“无边苦海浪冲撞,违逆真神愧友邦。为不当为干震怒,那知上帝本无双。苦海无边迥异江,自干天怒弗心降。不当为事今为尔,献祭香坛力独扛。”^①由违背耶和華会受罚,联想到上帝的无限威权,再联想到必须通过献祭来赎罪,倒也符合一个基督徒的观念,评述较能切合经文。

但有些诗歌在主题表达上与所评述经文的衔接就很不自然。如诗歌《不及繁多》:“无边苦海挺潺湲,不及多多不及繁。历代弟兄志传畧,木寻根本水寻源。苦海无边似浪翻,族名犹大见诸昆。所生子女多多数,不及之中妙莫言。”^②其评述的经文为“示每有十六个儿子、六个女儿,他弟兄的儿女不多,他们各家不如犹太族的人丁增多”(代上4:27)。经文客观陈述了犹太人西缅家族某个后裔的状况,属于犹太人族谱叙述的一部分。诗歌由此发出无边苦海之叹,令人难以理解。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诗歌的写作目的有关,诗歌虽谓“谈道”,但在教义上并没有什么深刻见解,对经文的图解也非中规中矩,毋宁说是“宣道”。向文化水平不高的民众宣讲福音,首要的是通俗,其次是有感染力。因为要通俗,有了前面提到的采用浅近文言。而为了有感染力,作者采用了“无边苦海……苦海无边……”的循环往复的表达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借用了U型结构。圣经经文的内容被填充于这一形式中,令内容从属于形式,对原文的忠实成为次之的要求。

①② 林乐知:《万国公报》,1878年,第507期。

不过，组诗虽然在处理方式上随意性很大，但还是遵循了经文的基本主旨。如强调独一真神及不拜偶像，突出上帝或耶稣的救恩等。以组诗的主题“天恩”为例，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恩典的观念，但与基督教的“天恩”观很不相同，它本质上是人恩，而且是“图报”的恩典，^①组诗在处理中则摆脱了这种观念，反复强调，拯救万民的是天恩，是基督教式的恩典。这种恩典意味着上帝对人白白施恩，不图回报。没有上帝的恩典，人只能陷于罪的泥潭而无力自救，这就是“苦海无边难自救”。而受恩的主体面对恩典就只能恭恭敬敬地敬拜上帝，并按耶稣教导的方式生活。诗歌还特别强调君权从属于神权，有意将基督教的天恩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皇恩区别开来。如诗歌“藐视丈夫”的最后一联“一违夫子违天命，怎对臣工和百僚”，“孰能得生”第三联“无论天子与庶民，凡敌主辈须知悔”，“是该撒臣”前两联“苦海无边难自救，为人间主尽臣忠。祭师众长皆参议，该撒王权自逞雄”。^②这显示出，在一些情况下，中国基督徒能够理解并忠实于基督教教义。

可是，原封不动地传达圣经的教义显然不可能。《谈道百篇》采用中国传统文学形式，用浅近文言书写，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这样的语体形式与文体特征，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精神的表征和载体”^③，圣经内容在这样的重新表述中，难免沾染中国传统思想的色彩。除此之外，语词本身的传统内涵和作者熏染的传统思想并不那么容易清除。

一些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具有特定内涵的词汇和表达被作者用以传达基督教思想。如贯穿全篇的“天恩浩荡”和“苦海无边”这两个表达。“苦海无边”本为佛教用语，而“天恩浩荡”明显源于

① 关于中国传统恩典观与圣经恩典观的不同，详参许相全：《圣经与中国传统恩典观之比较》，《圣经文学研究》2010年第4辑，第313—319页。

② 林乐知：《万国公报》，1878年，第507期。

③ 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第243页。

皇恩浩荡。虽说它们被用于表述基督教的沉沦与拯救,但其本身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并不会消失。当中国读者看到“天恩浩荡”一词时,头脑里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皇帝的威权形象,这个威权形象极有可能与玉皇大帝或如来佛祖等人物联系起来。而“苦海无边”则会使中国读者联想到佛教,罪感也就成了佛教众生皆苦之感。所以,无论是“天恩”还是“苦海”,经过读者思维习惯下的诠释,都会与基督教教义形成一定差距。另如“天良”、“正邪”、“仁义”、“圣贤”这些词,都带有儒家色彩,圣经文本中的义人形象通过这些语词的传达,很有可能就成了儒家中的君子形象,不知不觉中,圣徒保罗反倒成了颜回或子路。

一些作者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可能会偷渡到基督教思想中。基督教本有人人平等的观念,可匡正儒家的伦理纲常。而作者却在一些地方持妥协态度,如对夫权的维护:“夫唱妇随千古理,不遵天理即违条。苦海无边瑟失调,三纲不振恨难消。”“夫义妇自顺,此倡彼亦随。”“宜家宜室传儿训,立德立言教妇容。”^①经过诗歌的阐发,“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堂而皇之地进入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之中。

这让我们看到,《谈道百篇》的诗歌呈现与所评述的圣经经文之间终究还是存在着张力。

四、结 论

通过对《谈道百篇》组诗文本的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写作组诗的目的在于传教,所以文本显现出文学性对宗教性的妥协,这应是传教士文学作品的普遍特征。但另一方面,《谈道百篇》也呈现出了纯文学作品未必有的独特之处。宗教性与宣传性

① 林乐知:《万国公报》,1878年,第514期。

是否总对文本的文学性有害?这是值得思考的。第二,一种文化在异域的传播,或多或少都会发生变异,而变化的大小基于异域文化力量的强弱。就《谈道百篇》的文本来看,在封建力量依然很强的晚清,中国的基督教作者在对圣经及教义的理解上,既有忠实之处,也有隐含的张力。那么这种忠实和张力传达到普通民众中时又是怎样的状况呢?也许这是基督教传播及文化交流中更为关键的问题。

作者陈昱昊,云南民族大学2012级文艺学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文论与基督教美学的相关研究。近期发表论文《论〈呼啸山庄〉中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酒神”气质》、《“侵袭性”理论视野下的希斯克利夫》。

(程小娟 编)